

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

新世纪人文教育丛书

◆ 韩红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

韩红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人文教育丛书·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韩红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

ISBN 7-5004-4096-0

I.毛... II.韩... III.教育—中国 IV.II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564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邀编辑 傅 康 正 楠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吴 元 沈小兰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临汾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528.4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丛书定价 3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人类已经进入新世纪的时候,让我们再次记住两个日子: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诞生;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走了,永远不会醒来。但是,他留给后人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他,歌颂、崇拜者有之;谩骂、仇视者有之。但我们始终都应该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伟者自在。

毛泽东是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最有影响的伟人之一,而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还在于他不仅对悠久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有效的吸收和合理的批判,并以民主文化取而代之;而且还巧妙地寻找到了民族文化与汇集当时人类文明精粹的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的切入点,拯救了陷入困境之中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确立了中国近当代文化教育思想发展的新格局。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称谓,而的确是标志着某种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权威的象征。人们对他的思考、理解、研究,以及褒与贬、爱与憎,都会有意无意地与我们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诬蔑、谩骂,抑或辩护、歌颂,对他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几乎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和影响,因为严肃、公正地说,他的巨大威望和影响更重要的并不是靠权力建立起来的,毕竟他的学说是唯一能够使中华民族脱出亡国深淵的思想科学体系。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毛泽东从事教育实践的时

2 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

间最长、范围也最广：从湖南一师到党的“七大”，从一师附小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从湖南自修大学到抗日军政大学，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平民教育、党的教育、军队教育、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处处可见他的论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已被实践证明了其理论体系是完整的和科学的，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他的许多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还仍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作为一位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伟大教育家，毛泽东的人民教育观，是他的人民教育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深化的内在动力系统。他的人民教育观的形成，伴随着近当代文化教育思想转型和不断演变的历程，是多种复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是形成毛泽东的人民教育观的现实土壤；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文学和平民教育思潮和运动，是毛泽东的人民教育观产生的重要契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民思想，是毛泽东的人民教育观得以积淀的深层机制；毛泽东独特的成长历程和典型的个性特征，是毛泽东具有鲜明特点的人民教育观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毛泽东早期的平民教育活动，以及苏区、解放区的人民教育实践，特别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当时中国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教育实际而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是毛泽东的人民教育观日益完善的重要源泉。

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年人，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人民教育观之阶级性特征具体作用于新中国人民教育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因此，我们对他老人家都怀有一种纯洁、朴素、特殊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十几年前在“革命圣地”韶山所产生的冲动、崇敬、亲切和留连忘返的感觉；也是这种情感，20余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对相关资料搜集工作的执著；还是这种情感，促发我在1992年第二届全国毛泽东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

上,针对毛泽东是不是教育家,以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没有区别等观点,进行了措辞颇为激烈的发言……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当今中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的原因,贫困和文化偏远地区的儿童失学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高等教育平民化与城乡教育之间的“剪刀差”现象,依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甚至还有矛盾日益加剧的倾向……

但愿本书的问世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当今中国的人民教育问题予以关注与思考。

导　　言

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中华民族的世纪选择将面临三千年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巨变。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思想也必将经受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反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都会带来文化教育思想的变化，同时，文化教育思想也会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到一定的先导作用。在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时期，二者的有机互动关系则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此可见，研究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是当今社会现实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思想转型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毛泽东思想与近现代文化教育思想相互关系方面的研究，几十年来可谓是成果丰硕。一方面，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涉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甚至外交思想、书法艺术等领域也曾一度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另一方面，研究的深度也在不断加大，既有宏观方面的探究，也有微观方面的剖析，既有横向的相互作用关系方面的比较，也不乏纵向的发展历程方面的探源，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方面，虽然也成立了“全国毛泽东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等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并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但研究的力度有明显的后劲不足之感。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界，还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界，特别是教育史研究领域，不

2 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

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将毛泽东看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教育家,仍然是导致研究不能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政治、哲学、军事诸方面都有极高的建树,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同样也可以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试问古今中外又有哪一个著名的大教育家,不首先是一个大的哲学家,再试问又有哪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重视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而能够成就其事业。毛泽东正是以一个政治家独到的眼光和一个哲学家特有的聪慧,悟出了只有教育人民大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当然,政治上的成功并不完全归结于教育思想的先进。因为检验教育思想的工具是教育实践。如果不是毛泽东成功地寻找到了传统教育与现实力量的切入点,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近当代文化教育思想就不可能顺利实现转型。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在苏区、边区以及解放区民众教育实践的成功,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也会打上一个问号。由此可见,研究毛泽东的人民(民众、平民)教育思想,是实践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一提“平民教育”,仿佛就成了二三十年代那几个平民教育家的专利。诚然,我们并不想否认他们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及其平民教育实验。但是,与毛泽东的人民(平民、民众)教育实践相比,哪个更为成功呢?

一 毛泽东给人类留下了一笔珍贵的人民教育遗产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都是人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非仅仅因为毛泽东直到晚年仍认为他“历来是当教师的,现在还是当教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者中,产生于中小知识分子阶层,又有从教经历的人何其多

也。但在所有这些“教师”中，又有谁像毛泽东那样成为改变了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并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教师”。毛泽东的教育经历不仅贯穿始终，而且他对教育强烈的关注和参与，也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政治领袖。诚如人们所熟悉，毛泽东青年时曾当过小学老师，创办过自修大学，担任过农讲所的教员；中年在根据地开展人民教育，还不时进行演讲和教学；晚年时期，在被称作“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是唯一中国唯一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思想家。作为传统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他成为当时中国此起彼伏的教育革命的总导演，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深刻、复杂且意味深远。

然而，多年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或者将毛泽东教育思想按照常规意义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等等；或者教条套用教育教学术语，将毛泽东教育思想分割为教学思想、教育管理思想，等等。在这样一般化的表述中，毛泽东教育思想中那些真正强烈而独特的价值若暗若明，甚至隐而不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唯有把毛泽东教育思想作为人类非常珍贵的教育遗产进行认真的梳理，才能体味到毛泽东教育思想奇特的历史命运，也才能为新世纪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着力点就是要解决 20 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20 世纪初，中国新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扫盲治愚，以及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才。以此为出发点，变革教育自身便成为首当其冲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国后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领导和发动的三次教育革命之中，即 1958 年教育革命、1964 年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4 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被称为是“中国的苏联时期”的产物，它移植苏联高度集权、国家包揽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使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为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支持，在实践中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价值。在具体的动作中，不切实际的中国传统加上苏式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学校教育处于唯理性、唯智育的传统氛围中，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等问题比较严重。

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与“十七年教育”的现实相吻合的方面，主要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十七年教育”的这一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所赋予的。在重视教育的经济功利价值方面，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事实上，他毫不掩饰对文科教育的鄙视。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则与当时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虽然毛泽东这三次教育革命的背景、动机、形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教育价值和教育主张不但清晰明确，而且一以贯之。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大跃进”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所说的：“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① 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当时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权威“兴无灭资”、“拔白旗，树红旗”的批判斗争，以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二是对移植前苏联的正规化教育制度的不满，强调扩大教育机会，为工农子弟开门，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三是改革学校教育，以克服其脱离实际的弊端。教育革命的方式，

^① 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则都是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实行“全党办学”、“全民办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对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发展与全日制普通教育并行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在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学生和教师大量参加生产劳动；缩短中小学学制；大学组成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的委员会改造系科和专业，编写教材、讲义，集体著书，联系实际工程开展“真刀真枪”的科学的研究和毕业设计，等等。

伴随着全民诗歌运动和美术运动，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比较浪漫的。一些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建立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种种“教育奇迹”不久就烟消云散了。然而，这场浪漫的革命又确已深入到教育内部，触动了它的制度本质。当时比较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下放教育权力，中小学教育基本下放由地方管理领导；原由中央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多数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给地方领导。同时，改变高校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这种举动是破天荒的，虽然仅实行了一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缩短中小学学制的各种改革实验一直在进行。

1964年的教育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2月23日，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春节谈话），对“十七年教育”作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当时的教育改革是在急剧的升温化、政治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的宣传，学习毛著、下连当兵、参加“四清运动”之类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有人将“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教育称为“接班人教育”；在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几乎完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一项与智育和健康有关。尽管如此，当时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仍然是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

6 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

正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一样，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表，往往使人容易忽视毛泽东其他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关怀。由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批判所推动、以贯彻阶级路线而实现的，是毛泽东对精英主义教育的抵制，对教育平等的强调。为了加快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决定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积极发展小学，尤其是农村简易小学，以“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在中师和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除减少考试科目，并规定对退伍军人、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学生干部考生实行推荐与考试结合的办法（在城市中，这一路线的执行似乎主要使干部子弟受益）。此外，在教育制度、学制、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考试制度等各方面改革传统教育的弊端。当年七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开会，提出的《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大幅度地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现在看来仍是相当新鲜和超前的：建立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的不同需要制定城乡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计划小学基本学制为五年，不分段；中学基本学制为四年，不分段；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等。

1964年毛泽东的“春节谈话”，最激烈抨击的是当时的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他认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人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不能认为他对当时教育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政治动机，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尽管60年代教育改革规模相当大，步子也不小，但在1964年，他似乎对合同制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而变得不耐烦和怒气冲冲。当年夏天，在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和次年与王海蓉的谈话中，出现了倾向于政治解决的新的因素。毛泽东指出：教改的问题

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反对和对抗现行教育制度（这两个讲话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青年学生造反的作用）。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便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与十年“文化大革命”，通常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意味着学习前苏联、正规化、制度化、英才教育、学习雷锋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后者则意味着摧残、破坏、反制度和反文化、愚昧和荒诞，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和精神方向。然而，它又的确是一个贯通的历史：“十七年教育”在其大多数时间，一直是动荡不宁的。频繁的政治冲击和主观意志造成教育的大起大落，使高度的震荡性也成为它的特性之一。教育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价值，它后来被政治摧毁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劫难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我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也难以冷静地去认识清理其中隐含的解决中国教育的一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革命从 1966 年停止高考、学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始，致使正规的教育制度崩溃，学校教育中断，造成 20 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观。但“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又不仅仅是破坏，抛开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冲击不谈，从 1967 年“复课闹革命”、恢复中小学秩序，1971 年起大学恢复招生，“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建设性”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将学校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校教育极度政治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革命大批判”、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各级学校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从 12 年减为 9 年；从小学至大学毕业，由

8 毛泽东人民教育观论纲

17年减为12年。

改革学校教育。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和基础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学生花大量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参加生产劳动。

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中小学下放至城市的区或街道，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1969年起，原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大都下放给地方领导。

强调教育要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1972年提出农村要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学免试推荐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上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类实用的初级专业人才；1973年后，大学大量举办各种形式的短训班，为工厂、农村、部队培训技术骨干、理论骨干和各种实用人才。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钩，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实行结合生产和科研任务，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边干边学。不难看到，这些都是毛泽东在1958年、1964年均已提出过，并不同程度地改革和实践过的教育主张，它贯穿的仍是三个基本主题：突出政治、教育平等、教育联系实际；区别仅在于，前两次是体制内有序的渐进改革；而“文化大革命”则用极为暴烈地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方式，大幅度地实践其教育理想。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终于和盘亮出了他的教育理想。此前，他只是激烈地反对别人的做法和片断地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想法。他的教育理想也就是他的社会理想，后来被称为“五七道路”或“五七公社”：全国学解放军，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

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整个社会于是成为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

毛泽东构筑了一个学习化的教育社会，学校教育是全能型的，社会成员也具有全面发展的人格（这使我们想起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西方教育家类似的教育思想）；然而，毛泽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构想的这一“理想国”，却是以乡村社会为原型、以军旅生活为样板的，是一个准军事化的、取消社会分工、平均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大公社。这种公社的理念早在 1958 年便已流露，其萌芽可以追溯到青年时期他受康有为所释儒家大同说的影响。1919 年，他也曾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人民公社还是“五七公社”，都是有违历史进步并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的现代乌托邦。但是，也许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远比我们认识到的更为复杂。他的强烈追求，我们不能简单用所谓的——大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予以否定。而他的强烈反对，却包含着有待认识的合理内核。这也正是毛泽东教育思想获得奇特的当代命运之奥妙所在。

作为一个狂放和浪漫的教育革命者，毛泽东是一个悲壮的失败者。他以强硬的、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现行教育。然而，当他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反传统时，却并没有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也没有凭借更为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组织资源。他用政治凌驾和冲击教育，用政治批判代替教育批判，并使教育极度政治化，乃至成为简单的和直接的政治工具，从而扼杀了教育的主体性和生成发展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了教育崩溃。他用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改革教育，否定了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中的关键作用，导致了教育品质的退化、教育效率的低下。不仅他的方法和手段是传统的，他所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如前所述是极其传统和反现代化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泽东“以传统反传统”的悲剧。

但是，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作为一种教育精神、教育价值

和教育思潮来审视，毛泽东对“十七年教育”的怀疑和批判并非乏善可陈，而是发人深省。

毛泽东显然对现代教育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自然有他对科层化、正规化的官僚制度的抵触，比较而言，他更为习惯和喜欢比较自由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例如在青年时期，他曾表示过对私塾的好感，以及推崇书院精神）；但是，他的这种怀疑也深刻地源于新式教育在中国遭遇的基本矛盾。早在 1927 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发现“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反对“洋学堂”，他们“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因为“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① 而事实就是如此。1932 年国际联盟的报告也批评了中国新教育的“不一致性”：新一代知识分子将现代化与机械模仿外国等同起来，人民最必不可少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被忽视了，学校进行的是与周围生活和国家复兴的必要性无直接联系的抽象教育；在奢侈讲究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两者之间横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这一批评与毛泽东在 60 年代对当时教育的批评何其相似！显而易见，新式教育或现代教育如何与中国现实结合，适合中国的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实际需要，至今仍不失为一大时代难题。

事实上，毛泽东的教育遗产，不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所倡导的“教育革命”和他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对当时的美国的高等教育以及全世界的教育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和他的人民教育思想，曾经伴随着“三 M 主义”，或“三 M 万岁”的呼声，而使 20 世纪

^① 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0 页。

60年代的中国成为教育思想的出口国(三M者,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罗也。这三个人的名字不约而同,都以“M”打头,故得此名)。可见,对毛泽东的教育遗产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

巨人已经远去,毛泽东为解决20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的浪漫改革和破坏性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代价巨大的历史教训;也为我们留下一个不应遗失的精神方向,即始终对传统教育保持应有的警惕和清醒的批判意识,他的革命和失败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之路何其艰难崎岖,正所谓“任重而道远”。^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和大胆的探索历程。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既有哲学家的聪慧,又有思想家的深邃;既有政治家独到的见解,也有一个军事家应有的魄力。正因如此,也使得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充满了种种变数和难度。

二 中国教育史学界关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贯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研究的过程。虽然建国以后,人们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曾经掀起过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之后开始,一大批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应运问世,并分别在1993年和1996年达到两个研究高峰。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过程中,始终笼罩在巨人耀眼的光

^① 参阅杨东平:《革命与传统:毛泽东的教育遗产》,《东方》杂志1996年第1期。